



河北学刊

Hebei Academic Journal

ISSN 1003-7071, CN 13-1020/C

《河北学刊》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路径
作者：张杰
收稿日期：2023-11-12
网络首发日期：2024-04-12
引用格式：张杰.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路径[J/OL]. 河北学刊.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020.C.20240411.0845.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经济学观察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路径

张 杰

[摘 要]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本质性任务要求。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现象、新改革,催生中国理论的新发展。要构建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应明确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涵和新特点,剖析新质生产力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制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在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部门顺畅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众多机制体制性障碍,进而才能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发展和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与重点改革突破口。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中国实践;改革突破口

[基金项目]2020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项目“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障碍与对策研究”(ICERD18Z01)

[作者简介]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4)03-0127-08 [收稿日期]2023-11-12

一、构建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

(一)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

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本质性任务要求。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暴露出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改革,催生中国理论的新发展。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特征,有必要从三个层面来加以剖析:一是从最高层次的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两步走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此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偏上阶段国家快速跨越高收入阶段进而全面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阶段;二是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角度来看,中国正处于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全面转变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的经济发展任务是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激活激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经济发展内生型动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尽快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形成;三是从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来看,中国正在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靠打造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来塑造和强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基础。从这三个层次的内在关系来看,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任务的各自目标和内涵,缺乏一个具体的经济发展理论来对其加以阐述和指导,这就催生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因此,恰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①。这就对中国学者提出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http://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66.htm。

了构建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研究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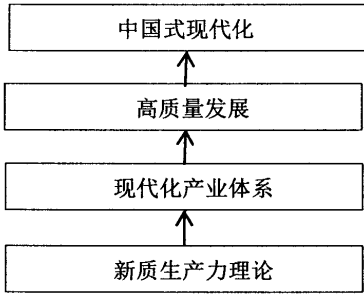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基础和指导价值

(二)如何认识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和新特点

与既有或传统的生产力理论有着本质区别,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始终坚持和贯彻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和包容现代西方生产力理论关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有益成分,全面考虑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进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机制体制性障碍的客观现实所提出的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新时代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任务实现的生产力理论。由此,可将新质生产力理论概括为如下多层次内涵: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既要体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这三大特征,亦需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先进生产力质态;二是必须落实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三个重要领域,中国的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形式是由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来实现的;三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蕴含着当前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及调整方向;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换言之,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最终要落实到完全依靠技术进步、制度环境改善、企业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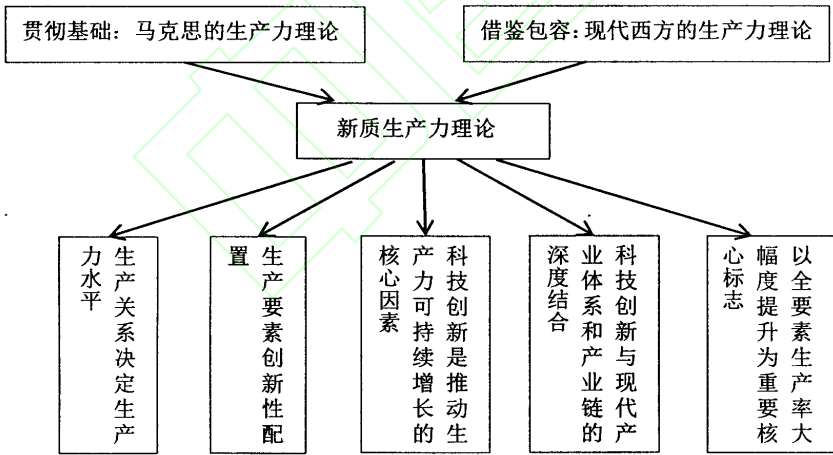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基础与核心内涵

依据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必须深刻认识构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新特点:

第一,新质生产力理论必须有效指导新形势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调整方向。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突出贡献是不再孤立地考察生产力,而是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视角,把生产力作为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因,确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即上层建筑改革可以影响经济基础。新质生产力理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和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逐步呈现出来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所逐步暴露出来的生产关系难以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各种机制体制性障碍,所逐步揭示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调整方向和着力点,将今后的经济工作重点和核心改革举措日益聚焦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集中到破除阻碍先进生产力形成的各种生产关系领域的机制体制性障碍。

第二,新质生产力理论必须有效指导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关系的调整方向。一方面,依据各生产要素在创造经济价值过程中相对贡献力度的相对变化格局,及时调整各要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收入份额,按照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使得创新和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价值的贡献作用逐步体现和提升,而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对经济价值的贡献作用逐步弱化,提高创新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收入份额,抑制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削弱资本和土地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较高份额地位;另一方面,将阐述和揭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的新方向,作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变,要落实以维持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高速增长水平为主的经济内生型动力,实现以激活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所具有的独特内需驱动型增长动力基础,不能仅仅将经济工作重点落到要素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方面,更要着重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方式的改革突破方面。尤其是要重视在主动推进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装备制造为主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对新型劳动者、先进劳动资料和高端劳动对象优化组合的巨大需求。

第三,新质生产力理论强化科技创新在一国生产创造活动中的突出地位。按照传统的生产力理论及其所构建的生产函数分析框架,核心理论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由于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和束缚,并不能依靠这些要素的粗放型规模扩张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要素投入具有要素边际报酬递增效应,进而是推动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新质生产力理论吸收和延续了既有生产力理论体系中针对科技创新在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贡献作用的科学认识,更加突出科技创新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尤其强调要实现中国人均 GDP 水平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乃至发达国家阶段的跨越式增长,只能依靠培育和激活本国的自主可控科技创新能力体系,主动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企业技术能力”三位一体式的国家创新体系布局,主动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实验研究→工程化研究→产业化商业化研究”贯通式的全创新链体系布局,主动从原始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主导的多层次自主可控创新能力体系布局,塑造维持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中高增长水平的内生动力机制。

第四,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和产业链的结合。科技创新对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支撑作用能否得到有效释放,很大程度上在于科技创新与一国现有和未来产业体系及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深度融合。这是既有生产力理论并未充分诠释和阐述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客观事实是,科技创新作为一国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要素投入,其对一国经济的贡献作用不仅仅在于自身作为要素投入的数量规模贡献乃至结构规模贡献,比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更在于科技创新能否深度渗透到一国的产业和产业链体系的发展进程中。一国的科技创新要素投入与该国的产业体系及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结合的范围越广、融合的程度越深,就越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形成。因此,不能狭隘地强调科技创新投入规模扩张对中国高质量的支撑作用,而要着重推进科技创新与中国正在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进的新型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与结合,这才是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新方法论所在。

第五,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 TFP)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生产效率水平的核心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表现为包含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因此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依据罗伯特·索罗定义的测算逻辑,全要素生产率是剔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在生产进程中规模投入简单扩张之后的“余值”,因此,从本质上讲,其主要反映的是一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综合推动作用程度,当然也包含了类似制度环境改善、企业管理能力提升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就揭示出解释和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仅承认具备要素边际报酬递增效应的技术进步在推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全面进入发达国家阶段的主导作用,也承认各种降低制度交易成

本和提高制度效率水平的机制体制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阶段目标的基础性作用。

(三)新质生产力理论需要处理的重点关系

第一,如何有效指导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态平衡关系。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来看,始终面临一个基础性问题,也就是如何协调与处理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要么是长期处于“供给大于需求”(即长期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要么是短期处于“供给小于需求”的发展矛盾,导致既有的生产力理论仍然拘囿于“供给创造需求”或“需求引致供给”的二维思维之中。客观事实是,针对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之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存在更为复杂的相互不匹配、不平衡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中国存在由于较为突出的不同群体之间固化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最优需求能力受到抑制和需求结构发生扭曲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由于供给侧的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滞后于中高收入群体对高质量产品升级换代需求所产生的供给侧结构性扭曲问题。这些不可忽略的矛盾与冲突,催生新质生产力理论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方的结构性动态变化关系所呈现出的复杂性特征来进行理论创新,提出符合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复杂性国情的新理论来指导实践。

第二,如何有效指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时调整。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来看,最为突出且最难以应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国家层面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相匹配的难题。其既突出表现在由于国家内部各种形式利益集团的制约和阻碍,必然会发生生产关系的调整严重滞后于生产力进步的重大现象,造成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持续进步的发展困局;也突出表现在生产力自身的进步受到国内各种形式的机制体制性障碍的阻碍,甚至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方向就根本背离了新型生产关系的要求,造成偏离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而难以支撑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方向。这在当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造成的核心阻碍效应,突出表现在生产关系层面所蕴含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固化在偏向资本、土地等要素所有者层面乃至行政垄断权所有者层面,而非普通劳动者、各种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要素所有者层面,这就使得供给侧所创造的利润、收益与财富主要集中在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乃至资本所有者,而难以传导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层面,进而造成中国形成较为突出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从而限制了中国自身所具有的独特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发挥,限制了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制约了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和产业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高端生产设备、关键基础材料及关键核心零配件等的长期依赖,迫使中国在制造业层面的生产力水平被限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相对中低水平,而且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依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再叠加中国各级政府对地区产业发展的各种不合理干预所造成的各种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对中国发展先进生产力造成了难以忽略的诸多负面影响,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第三,如何有效指导资本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增长。一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所有者,是决定该国生产力水平的最关键因素。其中,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所有者在国民生产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的尤为重要的因素。可以归纳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倘若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在该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主要地位,并且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始终保持着与真实 GDP 增长水平的同步性和协调性,那么,该国就必然处于经济增长的最优状态和最佳路径。当然,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所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之中的分配比例关系,在一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会发生动态变化,但其演化过程仍具有规律性,具有一般理论的价值借鉴。然而,从中国当前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所暴露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关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报酬难以同步性协同增长的重要困局,迫切需要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指导和解决。从表面上看,中国当前情形下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关键要素所有者收入报酬难以同步性协同增长困局现象的发生与中国特定时期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供需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密切相关;从深层次来看,也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新型演化规律的有限认知,以及带来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之间功能边界的定位不清密切相关。

第四,如何有效指导实体经济和金融协同发展关系。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已成为影响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金融资本不仅仅是构成生产力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更是在国家层面的生产关系运行机制中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工具功能。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金融全球化结合制造业全球化,更是成为影响类似中国这样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乃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调整的关键因素。从中国当前的发展经验来看,不容否认的是,金融对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代表的生产力以及对生产关系背后隐含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造成了不容忽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金融发展已出现了偏离支持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甚至阻碍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制约科技创新自主能力提升等突出问题。而且,在中国的金融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诸多“脱实向虚”和“金融野蛮生长”等现象,使得中国出现了专门的食利群体和金融利益集团,不仅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且使得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了持续扩大乃至高位固化的发展困境。

二、当前制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核心因素分析

第一,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生产关系调整滞后→收入不平等固化→有效需求不足→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尚未充分激发→先进生产力增长动力弱化”的发展路径之中。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无论是从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长角度来看,还是从多数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角度来看,均程度不等地存在部分群体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多数消费者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持续弱化的问题。需求侧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突出表现在多数产业面临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现象。而且,中国类似“新三样”的新兴产品也出现了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现象。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状态的持续,必然会造成中国多数产业或企业的利润率低下、长期投资能力不足和研发投入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最终造成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能力弱化,以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形成动力不足的发展困局。然而,从中国当前面临的有效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形成机制来看,本质上与当前生产关系的调整面临一系列机制体制性障碍和既有利益集团的束缚密切相关。客观事实是,在中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国民经济运行体制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既表现为资本所有者和普通劳动者群体之间突出的收入不平等,也表现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更体现为不同区域就业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这些制约中国居民群体的有效需求规模持续扩张和需求结构优化升级的诸多收入不平等现象,背后是与中国在生产关系领域的调整与改革动力机制缺失,及其所造成的各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僵化、固化乃至改革动力机制弱化的突出问题。只要在当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既有的要素分配机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就会始终陷入“生产关系调整滞后→收入不平等固化→有效需求不足→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尚未充分激发→先进生产力增长动力弱化”的恶性发展路径之中。

第二,中国的要素利益分配形成了偏向于土地、资本、行政垄断权力等的分配格局,普通劳动者、各类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等要素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尚未凸显。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为核心问题是,要素利益分配格局中发生了偏向于土地、资本乃至行政垄断权力等的突出现象。一方面,中国在进入房地产高速发展阶段中,发生了国民财富向房地产部门、金融部门以及土地所有者过度转移和集中的突出问题,这就造成土地要素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成果的最大分享者。具体来看,各级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不可遏制地存在利用持续增长的land交易价格来最大化自身收入的内在动机。而相关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利用持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来为购房者提供按揭贷款以获得巨额收入,部分资本所有者乃至企业经营者也偏好于利用持续上涨的房地产商品来进行投资投机活动以获得短期收益最大化,甚至在很多城市的企业和居民群体中形成了专门依靠高额房租收入来获得资本收益的食利群体阶层。这就导致中国在各级政府、金融机构、部分资本所有者之间围绕房地产产业链体系,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利用土地、资本要素

获得超额利益分配权利的巨大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中国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部门利用自身独特的行政垄断权力和市场进入壁垒,形成了资本所有者在国民财富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造成了金融机构部门获取的利润严重超过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赚取的利润。按照一般的金融发展逻辑,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是共生共赢关系,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工业资本利润的创造和分配获得相应的合理收益。而从中国各类金融机构的现实运行逻辑来看,无论是银行资本还是各种金融市场的投资资本,均程度不等地利用自身的金融行政垄断地位来获取超额利益,甚至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普遍发生了“投行恶意包装企业→推动企业上市→攫取普通投资者利益→获取金融机构超额利益”的不当利益链条行为。这就迫使中国金融部门形成了利用自身行政垄断权力获取资本要素收益最大化的巨大利益集团。相反,普通劳动者、各类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并未获得相对应的要素报酬收入,这是导致中国要素利益分配格局乃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分配机制扭曲的关键所在,也是造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持续扩大和固化的核心机制。^①

第三,中国在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部门顺畅流动的过程中,存在众多机制体制性障碍。中国正在布局的以打造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的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要将以高端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现代金融资本等为主的优质生产要素,与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结合,进而促进那些具有创造高收入就业岗位、高附加值能力、高技术含量的中高端产业体系壮大,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然而,依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思考,当前在促进中国高端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现代金融资本等优质生产要素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移和集聚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可忽略的众多机制体制性障碍。其具体表现在:一是科技创新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移方面存在一系列障碍。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类高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作为政府财政资金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主要投入支持对象所产生的各类科研成果并不能契合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现实需求,造成了产学研之间的“肠梗阻”顽疾;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仍聚焦在激励企业产能扩张和税收贡献领域,而并非调整转向到有效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方面,造成中国本土企业在“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严重不足。二是人力资源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移方面存在一系列障碍。一方面,中国的各类高校所培养的包括高端研发人员、工程师和专业技能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与中国当前正在培育及打造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多层次人才所产生的现实需求,存在较多方面的脱节乃至脱离问题,造成中国虽然是理工类学科人才规模的全球培养大国,却表现为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的中高端人才的缺乏,表现为国家所需的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供给能力的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培养的顶尖人才和专业化人才,要么迁移到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集聚到金融部门,而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却长期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三是金融资源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移方面存在一系列障碍。一方面,随着中国以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金融资金渗透进入到这些产业部门,对接和满足以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制造为主的高质量资本更新与资产投入需求,对接和满足体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期巨额研发投入需求。然而,当前中国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部门普遍偏向于遵循低风险的短期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和监管逻辑,已经完全不适应中国当前正在全面布局的新质生产力体系带来的各种形式融资需求,迫切需要对中国当前以银行中介机构主导的间接型融资体系推进全能制银行导向的改革。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当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而言,无论是从各类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公募私募基金乃至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各层次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角度来看,并不能真正有效引导金融市场资金进入那些真正具备持续创造市场价值和全球领先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或企业领域。相反,其与部分企业形成合谋,通过上市策略来获取

①张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有序扩张的内在逻辑与形成机制》,《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金融市场的额外利益,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应有的金融支撑功能。

三、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改革突破口

第一,将发展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改革突破口。当前最重要的改革突破口应着重瞄准在:一是将要素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整设定为中国新型生产关系的改革突破口,尤其要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落在促进与构建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知识专利、数据等关键要素和新型要素,提高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地位。相应地,适度调整和逐步弱化资本、土地、行政垄断权力等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地位,进而从生产关系层面形成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体制机制。二是将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设定为中国新型生产关系的重点改革突破口,要加快打造“教育—人才—科技”三位一体式的新型人才培育机制,破解中国当前人才培养制度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多层次人才需求不相匹配的顽疾。尤其是要通过构建中国优势的产学研政贯通式机制,破解中国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不相匹配的痼疾。三是精准识别束缚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堵点卡点,通过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促进各类优质新型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部门顺畅流动的新机制的形成,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知识专利和数据等关键要素与新型要素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转移与集聚的关键堵点卡点,重视资本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向原始创新、颠覆型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的转移和集聚的关键堵点卡点,重视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和金融资金等要素向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部门转移与集聚的关键堵点卡点。

第二,始终坚持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布局原则。这具体体现在:一是处理好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禀赋条件和区域优势特征,构建同时推进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此,要求各地方政府在落实布局中央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时,既要重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新质生产力,也要重视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的新质生产力,不能忽略或过早过快放弃传统产业对多数地区经济的支撑作用,而盲目利用地区产业政策来扶持地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二是处理好新质生产力体系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能否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决定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否获得持续提升的内在动力,而国民经济中相对过高的服务业占比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能力。为此,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布局逻辑中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与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相融合的核心发展模式,还要警惕中国部分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错误发展思路苗头。三是要完整且正确地理解中国正在布局的新质生产力体系区域分布格局中所具备的区域集聚特征以及引发的区域不平衡特征。按照产业集聚理论和要素集聚规律,必然可以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愈发呈现出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不可分离且日益紧密融合的发展特征。鉴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也日益呈现出向超大规模城市、重点核心城市以及拥有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的发达区域板块转移和集聚的重要特征,从而会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主要会在超大规模城市、重点核心城市以及拥有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的发达区域板块培育和壮大的发展事实,进而必然会逐步加剧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均衡态势。为此,中国在从顶层设计层面谋篇布局新质生产力时,要科学认识及理性遵循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的这种集聚效应所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内在规律,加快推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关键要素、高端要素和新型要素向超大规模城市、重点核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区域转移与集聚,而不要盲目实施区域发展均等化战略,从而阻碍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所需要的支撑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发挥。

第三,积极推进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建设。从中国当前正在布局的以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为主线的新质生产力体

系来看,均需要金融资金以投资高端资本更新和支持长期研发投入的主要形式加快渗透到这些产业或企业部门。或在某种程度上说,能否打造出围绕和对接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催生出来的各种形式融资需求的现代金融体系,决定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布局的空间、方向和效率。具体来看:一是充分重视以资本链资金链为主是要素能力在中国当前新型生产关系调整中的重要地位。资本作为最基础的生产要素,不仅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决定着中国当前的要素利益分配机制及其背后的生产关系演化逻辑,具有“触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功能。由此,须将如何推动当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设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改革任务,作为顶层设计层面的战略改革任务。换言之,须将金融体制改革上升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上升为同时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改革突破口。二是尽快推进间接融资功能向直接融资功能转变导向的、具有全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覆盖功能的资本链资金链要素体制改革。一方面,针对当前中国已完全不适应制造企业多样化、长周期融资需求的银行体系而言,尽快推进全能银行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对于当前中国以各种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险基金、私募公募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以及各类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改革重点应落在打造及强化全覆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与发展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功能。三是围绕“制造强国”目标推动中国特色“金融强国”建设。当代中国“金融强国”战略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是“制造强国”,只有在中国由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规模国家发展成为全球最强同时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的进程中,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可获得最为坚实的基础性支撑和发展空间,当代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才能实现。为此,必须围绕“制造强国”目标推进“金融强国”,将其作为中国当前新型生产关系调整的重点改革突破口。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Innovation and China’s Practical Path

ZHANG Jie

Abstract: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base it on the intrinsic tasks required by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mmary, new problems, new phenomena, and new reform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given rise to new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theory.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at mee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core connotations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alyze the key relationships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y needs to focus on and resolve, and further examine the core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constrai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evel, as well as the numerous institutional and systemic barriers that exist in China in promoting the flow of various advanced production factors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ectors.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propose the core direction and key areas of re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layout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ming period.

Key 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hina’s practice; breakthrough in reform

[责任编辑:王月霞]